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两重向度

——兼论人工智能分工与人的解放

孙 杨, 冯建华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 江苏徐州 221000)

摘 要: 分工是马克思建构其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之一。为探究分工理论向度的改变及其与唯物史观自身发展的内在关联,以马克思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从哲学批判时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对分工的研究历经了从主体向度到客体向度的改变,这一改变也与唯物史观的萌芽、建立与运用的过程相一致。研究发现,这一转换体现着马克思由探讨社会分工过渡到探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对人的解放的探究也历经从人到物,又从物回归到人的转换。把握好马克思分工理论主体与客体两重向度,为理解当下人工智能分工及其所带来的双重效应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 分工;唯物史观;主体向度;客体向度;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1)02-0042-08

Two dimensions of Marxist theory on division of labor: On AI division of labor and human liberation

SUN Yang, FENG Jianhua

(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Paradig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 Division of labo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Marx's construction of his theoretical system.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nge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and its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takes Marx's classic tex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Marx's continuous research on this theory from the period of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to the period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Marx's research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underwent a change from the subject dimension to the object dimension. This chang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germination,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Marx's transition from discuss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society to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exploration from human liberation also experienced from human to objects and from objects to human. Grasping the dual dimensions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 Marx's division of labor can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division of labor and its dual effect.

Key words: division of lab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ubject dimension; object dimens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收稿日期:2020-06-22 网络出版日期:2020-09-28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2019XKT794)

作者简介:孙 杨(1997—),男,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冯建华, E-mail:13815301350@126.com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研究伊始,学者们对诸如分工理论的类型、分工理论的本质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探讨。对于分工的类型,秦庆武^[1]从客体、主体以及主客体结合三方面进行了划分,赵家祥^[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分工划分为自然、自发、半自觉和自觉分工。对于分工的本质,学者们有着分工属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范畴的争论,韩庆祥^[3]对此有着新的解释,他认为分工兼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范畴,这一观点自提出后也逐渐得到公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意识到单纯地研究分工本身并不足以彰显这一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性,因此逐渐将重点放在探究分工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之上。而对于分工与唯物史观,学者们对分工理论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重要性达到了几近统一的共识,普遍认为马克思是从分工范畴出发去构建唯物史观的。张一兵^[4]认为马克思是从分工这个“新问题式”出发建构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视域,王磊^[5]指出马克思通过分工加深了对物质生产劳动的认识,找到了社会历史的基础,从而加深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认识。然而,学者们大多把重点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这本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著作之上,以这本著作作为节点,似乎在这之后马克思便不再将重点放在探讨分工理论了,由此造成了这一理论在唯物史观建立之后的发展历程鲜有人提及。例如,张溟久^[6]提出,在《形态》之后分工已经不再是马克思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了。这一观点发展到当下,多数学者更多地只是从经济学的层面探究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理论来源以及发展历程,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理论内在的哲学基础。

本文以马克思经典著作为文本依据,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发展概括为“主体”与“客体”两重向度,哲学批判时期对应着分工的主体向度,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对应着分工的客体向度。在向度的转换中马克思对分工具体形式的探究也经历了从社会分工到工场内部分工最终到研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分工。同时,探讨在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进一步深究政治经济学在唯物史观不同时期出场方式的变化。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建构的“新世界观”,实际上一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也理应以唯物史观为内在的逻辑线索进行探讨。以马克思分工理论为方法论基础,对当代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分工形式的变化以及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给出一定的解决方案。

一、唯物史观的萌芽与主体向度的分工理论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秉持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理念,因此在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时,不免陷入到“苦恼的疑问”之中,对这一疑问的不断思索促使着马克思逐步转向唯物主义的阵营。在这一转变早期,对于当下流行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并没有进行批判,而只是停留在对他们所论述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反思之中,或者说,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地对经济学感兴趣,其研究重点放在对国家和法的探究之中。直到阅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对它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真正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8]99},从那之后马克思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开始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843年秋起马克思“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8]9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第一次开始对分工进行研究。但是,由于此时的研究重点是在厘清私有财产与人的异化,因此对于分工,马克思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进行探究,仅仅穿插在文本中并以一个片段的形式进行阐述。在这个片段中,马克思考察了包括斯密在内的多位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分工的观点。在谈及分工时他说道:“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9]不难看出,当时马克思所论述的还只是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是以斯密所建立的交换逻辑为基础的。斯密在探究分工时,将视野重点放在分工的社会性层面,更加关注分工的交换价值效应,并且认为分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没有跳出国民经济学的桎梏,但是已经萌发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批判。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国民经济学家对分工的论述忽视了对分工条件下的个人进行探究,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受限于其所阐述的分工产生的种种好处,而是从工人现实的社会情境出发,描绘了由分工所导致的三种社会状态:社会财富衰落、社会财富增长以及社会财富到

达顶点,并认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状态,工人的境遇都不会发生转变。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撰写《手稿》时期的确对国民经济学家包括分工在内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是完备的。即是说,马克思是在肯定国民经济学家所论述的交换层面的社会分工的前提下,批判了这种分工对现实的人的发展的局限,却不曾对特定时期分工所表现出的具体形态提出质疑。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除了社会分工外,还有着工场内部分工的存在。这也恰恰反映出这时候的马克思极力想要对国民经济学家进行清算,但是由于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不足,对分工的理解相反地深刻烙印着国民经济学的痕迹。

进一步探究对国民经济学家批判的方式,在《手稿》的写作中,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置于哲学批判的视域,也就是说,对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出发重新进行审视。这种问题域的转变也体现在对分工的研究上,由于马克思还没有建构其“新世界观”,或者说,唯物史观仅仅只是处在萌芽时期,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视域审视实际上还是受制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对分工理论的研究也同样受制于此。人本学着重探究人的生存状况是否符合“类”的要求,而“类”在费尔巴哈看来是绝对的、前提性的预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时候的马克思将探究工人的境况——诸如为他特别强调的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以及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局限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忽视了对其前提的探究。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为人本学所论述的人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片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的人,这就是说,马克思想要探究现实的人的生存境况,但却最终落脚点却是在对抽象的人的研究上。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分工更多地体现着与主体性相关联,并且这一主体性也只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人的主体性。以人本学为内在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解放的路径时,视野的着眼点放在扬弃“劳动异化”。马克思在这时指出是私有财产的存在造成了工人的异化现象,而同时他又说到“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10],分工也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由私有财产所导致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唯物史观的建立与过渡时期的分工理论

到了写作《形态》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对于分工,局限于人本学视域的研究无法解决现实

的人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哲学进行彻底地清算,或者说,要进行哲学观意义上的变革。所以在面对政治经济学问题时,批判本身不再是马克思最为直接的目的,其更为深层的逻辑是为了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方式,从而实现自身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的研究视域不再是人本学意义上抽象的人,而是发展到对真正的现实的人的探究。

《形态》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建构了唯物史观,用恩格斯的话说是一种“新世界观”的出现。而对于这种“新世界观”,马克思也的确是从分工入手,考察了分工与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等唯物史观诸多范畴之间的关系。如果将视野的重点停留于此,似乎马克思的确建构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工理论,但是究其逻辑深入,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此时为他所建构的唯物史观还不是完备的唯物史观,或者用我们当下的研究概括即没有厘清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想要建构符合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从而忽视了对特定历史时期分工的探究,因此难免陷入了以下几点理论困境。

首先,马克思这时将分工和所有制同构,而这样的提法从另一个层面恰恰反映出此时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并没有脱离斯密所提的“分工逻辑”,或者说,并没有脱离原有的从交换维度进行的思考,因此这时候的分工理论,也与斯密一样囿于“泛分工论”的理论局限。而对于这种“泛分工论”,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中借用“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升,却又转而在第三章中提出了“斯密定理”,亦即“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11]。也就是说,由于斯密视野的局限,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种为他所论述的分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分工,所以将重点放在交换也就是社会分工上,“因此,‘泛分工论’的实质就是以社会分工的普遍性来掩盖或消解工场内部分工的特殊性。”^[12]显然,从分工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此时的马克思与斯密陷入了同样的陷阱,这一点也与《手稿》不无相同。

其次,由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重点是在建构唯物史观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表面上看确实对分工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实际上这时候的分工理论并不被马克思当作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区分分工不同形式的重要性,他所谈及分工,只是为了将分工作为中介勾连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为了唯物史观的建构服务。抑或可以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从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来建

构哲学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反过来用唯物史观重新透析分工,对于分工的理解,只是将其当作手段,用以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根据,而不是对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分工所表现的形式进行探讨。因为只用做到前一步,就可以为这一时期其所论述的广义的、代表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的建立进行佐证,因此马克思所论述的分工代指的都是社会分工,而不是具体的诸如其后期做了区分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工场内部分工。在这里分工所体现的只是其“工具理性”,进一步深究的话,这也同样是“泛分工论”理论缺陷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写作《形态》时,虽然从哲学观上已经发生转变,但是对分工的理解上,仍然囿于斯密从交换的层面进行探讨的窠臼之中。因此,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且着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论述,但是由于没有脱离斯密经济学思想的桎梏,这一时期马克思不可能提出有别于“社会分工”的“工场内部分工”的存在,以至于在谈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将大工业说成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3]59},这种“最广泛的分工”代指的也即是“社会分工”。

在建构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研究最终的价值指向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13]64}。由于马克思把分工和所有制相等同,所以这时候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3]65}。按照当下学者对“消灭分工”这一思想的解读,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消灭一切分工,消灭分工一方面应该是消灭旧式的不合理的分工,另一方面也应该是生产过程中束缚人的分工。而正因为马克思此时没有对两种分工进行区分,所以提出了“消灭分工”这一实际上矛盾的论断,并且由于马克思只看到了分工的社会性层面,因此“消灭分工”也只能是倾向于消灭前一类分工,而忽视了后一类分工。因此,不能先验地过度解读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应该承认其思想仍存在着不足之处。

用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的话说,马克思的重点实际上是在阐释“建立共产主义的关键性因素是消除劳动分工”^{[8]147},也就是说通过消灭分工消灭

私有制和劳动本身,从而达到人的解放。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极力想要跳出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框架,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但是,与《手稿》时期的论述相比,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寻求的人的解放,虽然路径不同——前者从哲学层面,后者从经济学层面(当然内在是由哲学视域进行审视)——究其理论深处仍然是一种“异化和异化的克服”,或者说,前者从哲学层面提出“扬弃劳动异化”,后者从经济学层面提出“消灭社会分工”,虽然具体的方式不同,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是说,虽然《形态》时期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客体向度,但并没有对客体向度下具体的分工形态和人的解放进行论述,分工仍然是以主体向度为主,从主体向度入手进行探讨。因此,就算马克思在《形态》中仍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从哲学史上看,也不能凭此就将这一时期归结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真正出场,还是应该将其置于哲学批判的视域,映射到分工的研究上,亦即这一时期的分工理论是触及客体向度,但主要是以主体向度为主的过渡时期的分工理论。

三、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客体向度的分工理论

如果说从《手稿》到《形态》,马克思都是侧重于从主体向度入手探究分工理论,而最开始意识到要从客体向度探究分工是在《哲学的贫困》(简称《贫困》)之中。从思想上来看,马克思在写作这本论战性质的著作时,对于经济学知识已经有了较多的积累,并且受益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影响,马克思初步意识到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不同,并进一步实现了从探究分工的交换关系层面到生产过程层面的转变。基于此,马克思意识到了除了社会分工,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分工的存在,“整个社会的分工……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工场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式中是很不发达的”^[14],但是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对两者进行具体的区分。到了《资本论》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变成了唯物史观的在场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阐释,也就是说,马克思得以系统地运用唯物史观来建构其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因此对于分工问题的研究,马克思的方法也才得以发生转向,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去透析具体的分工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不再简单地从中介角度看待分工,对分工仅仅做社会分工层面的探讨,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

理论支撑,深入到具体物质生产的客体领域,这也使得他可以准确地对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的区别做出界定。

对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的区分大体可以从两个维度入手:其一,经济批判的社会维度;其二,现代批判的历史维度。从经济批判的社会维度上看,社会分工是以交换为媒介的:“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15]。如果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者只创造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工是不存在的。只有当生产资料独立属于每一个生产者,每一个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都具有了商品的属性,也就是说,不仅具有了使用价值,还同样兼具着价值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的过程中个人与他人有了一定的社会联系。随着交换的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也便产生并处在不断的扩大之中。而在工场内部分工中,这种分工存在的基础是资本,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资本家牢牢地掌握着生产资料。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雇佣工人,在这种分工的条件下,工人并不生产商品,而只是作为商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作为全部劳动的一部分,所有工人的劳动过程所得的产品相加才能够被称作商品,因此工人无法独立存在。而从现代批判的历史维度入手探讨两种分工的不同,马克思论述到:“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6]也就是说,无论社会的所有制是何种形式,社会分工都会存在,而工场内部分工只有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得以存在。同样,从这两种维度入手,马克思也探究了两种分工的联系:“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17]215}可以看出,从经济批判的社会维度上看,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从现代批判的历史维度上看,工场内部分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这也内在蕴含着两者可以在统一的社会形态中共同存在的必然性基础。

当然,马克思花费大量的笔墨区分这两类分工,其目的不仅仅只在于此。马克思想要以社会历史观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去解读当时的社会,而在当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本身正发生

着巨大的变化,机器大工业分工产生并逐步取代工场手工业分工。因此,这种相互矛盾运动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于机器大工业,马克思首先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7]218},但是在深入探究资本逻辑后,马克思意识到,“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夺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的程度”^{[17]220}。也就是说,如果往前追溯历史,可以将工场手工业作为机器大工业的前历史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工场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所表现出的不同也同样可以运用到对机器大工业的阐述中,但是机器大工业分工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剥削。一方面,机器进入生产过程中之后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并且由于机器可以代替原来工人的具体的工作,一部分工人就会面临失业;另一方面,由于机器的进入还是需要一部分人对机器进行控制,所以生产过程中会保留一些工人,但是这些工人不再像以前一样,以各自所拥有的技能进行分工,而是依附于机器,换句话说,在生产过程中,机器成为了主体,工人的分工是用来操作不同的机器,亦即看管和使用机器。也就是说,在大工业时期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多了机器这一中介,资本统治工人的现象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在同时,工人们还要受到机器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与工场手工业时期不同,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只要具备相应能力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就会被需要,所以工人们至少可以有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在大工业时期,工人这种职业的固定性被机器所取消,因为任何人——只要会使用机器——都可以被资本家所雇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女工和童工的数量愈发增多。同时不仅如此,人们的能动性也被同样取消了。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依附于机器,机器给予人“指令”,工人只需要机械性地完成这一“指令”,生产过程完全体现着“机器理性”,与工人毫无瓜葛。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的工场手工业中所体现出的工人的能动性被压制了,也就是说,在机器主导的大工业时期,资本对人的统治不增反减,愈发激烈,工人想要生存,必须依附于机器、依附于资本。

因此,资本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18]。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关系要依靠被人所创造出来的物来呈现,人们

成为了物化的人,受到物的支配,而反过来物却具有了人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也无法得到直接展现,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资本增值的多少来断定,同样不属于劳动者个人。这就造成了现实的人成了物,而物成为了现实的人的后果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主体性被机器抹杀了,机器自身的客体性凌驾于人的主体性之上。为了解决这一物化的现状,马克思在这时的研究实际指向了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批判,并且进一步推翻这种压抑着人的本性的生产关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的现实的解放,因此这一时期对人的现实的解放不再是原有的主体向度的解放,而是转变为在具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之中,寻求客体向度的解放。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对马克思进行研究的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及到《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时,认为其完全囿于客观逻辑,这种理解显然有失偏颇。如果按照西方学者这一提法,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仅低于历史水平,甚至低于其自身。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客体向度入手探讨人的解放,实际上内在包含着对主体的探讨,并且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剥夺人的主体性。不同的是,马克思前期对分工主体向度的探讨,完全将现实的生产过程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外,其所要论述的人的解放也只是“泛分工论”的社会分工层面上“泛主体性”的解放,并不是现实的人的解放。而这一时期的客体向度,是在现实的人的进一步研究之后,不仅达到了客体向度的解放,同样实现人的主体的解放。映射到分工上,也就是说,这种解放不仅包括社会分工层面,还包括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层面,在当时一方面体现为工场手工业分工,另一方面体现为机器大工业分工的人的解放。同时,对这种相互矛盾运动下人的解放的探讨不仅适用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同样可以将其当作方法论用以审视之后的任何时代。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仅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对社会历史和自身的下降,相反地,是在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理解之后,理论体系革新的一次质的飞跃。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分工与人的解放

即使将研究的视野放在当下,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仍然具有着广泛的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其提出后的长时间内都持续在场,意

味着这一哲学体系符合人类发展和建设的普遍规律。正如唯物史观所带给人们的方法论指导,任何理论的在场都要结合一定的时代特征,因此,经过了多次生产力革命的革新,马克思分工理论想要在当今社会同样保持着在场的生命力,需要与时代结合,做到合理有机的统一。

随着人类对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利用,以及相应的产业变革,“工业 4.0”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第四次工业革命”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按照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定义,学界将这次工业革命所处的时代定义为“智能化时代”。如果说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准确地把握了在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特定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现实社会,那么唯物史观的当下出场,就应该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出场。从分工的角度出发,除了社会分工在任何时代都得以存在,分工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多次转变,最终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分工(当然机器大工业分工在信息时代也基本适用),而人工智能的出现逐渐使得机器大工业分工向着“智能化分工”演进。而对于智能化分工,显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推动生产力、人类解放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影响”^[19],一方面,从分工的交换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的运用,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改变了原有的分工形式,为消灭旧式分工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从分工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来看,与机器大工业分工相比,人工智能分工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智能化达到顶峰之后,生产过程不再需要人的活动参与,也就是说,在机器大工业分工的模式下,无论生产过程多么固定、机械和单调,每个生产过程都还是需要工人对机器的操控,但是在人工智能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机器智能化的大幅度提升,原来的生产过程所必需的人力参与,例如分拣、组装等,大部分都可以由高智能化的机器独立完成,这也使得传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分工模式得以打破,越来越多的工人从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多地从事脑力劳动以取代原本的体力劳动。同时对于现代一些智能化机器还暂时无法取代的生产环节,仍然从事相关生产的工人,也可以利用技术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大量的劳动时间用以从事非生产性质的劳动。可以说,如果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出发,人工智能为达到这一目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但是,正如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进行探讨时不

仅肯定了这种形式下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样也对机器的广泛使用下人的剥削的加深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批判,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分析,那么在面对人工智能时,就不能只看到其积极性所在,也要直面可能带来的困境。首先,人工智能分工的确消灭了大量的旧式分工,但是还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旧式分工的从业者,在原有的分工形式逐渐消失的背景下,也会相应地面临失业的情况,这是在社会分工层面上失业人数的增多;其次,在生产领域中,智能化的运用使得很多工人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这些工人里一部分从事脑力劳动,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相关的知识不足或是脑力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数量的差额等原因,也会被辞退而成为失业者,这是从生产过程出发所得出的失业人数的增多。可以说,这两点困境实际上在工场手工业分工向机器大工业分工转变时也存在过,但是不同的是,机器大工业分工对工人从事生产活动还具有相当的需求,而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对旧式分工的消灭更甚于机器大工业分工,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完全不需要人力参与生产。因此,在人工智能分工的背景下讨论上述两点困境相比在机器大工业分工视域下的讨论意义更为重大。所以说,按照对上述两种困境的探讨,人工智能分工会造成不仅是社会分工层面,而且是生产活动层面双重的失业现象的出现。这些失业者再次进入到社会中成为“社会人”,这种“社会人”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已经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相反的,是受到资本逻辑的奴役、被资本逻辑完全剥削后所抛弃的牺牲品,为了生存不得已再次从事一些仅仅满足生存需要的劳动,这部分人,相比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谈及的“异化的人”,异化的程度显然更甚。

其实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就已经意识到了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普遍推广,会造成劳动过程不再从属于个体主体,而是个人从属于资本现象的出现,并且随之带来人的主体性的逐步丧失。实际上,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机器作为技术革命的产物,其历史作用和存在的问题都会必然产生,这一点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已经阐述的很清楚。在面对又一次技术革命的产物人工智能时,也要致力于从当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殊阶段入手,去准确界定人工智能的作用与问题,从而探寻未来

发展的真正路径。这也为中国在当下的科技革命浪潮中的发展提出了一定的实践要求。国家在大力发展智能化的同时,也要重视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为产业转型背景下工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一定的保障,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完善社会的福利保障政策,以防止由于智能化的介入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激化现象的产生。企业要加强对于工人智能技术与理论的相关培训,以便更多的工人在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时可以更好地转型脑力劳动而不至于失业。另外,这也对个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适应时代的浪潮,学习时代先进技术理论,毕竟技术可能会被机器所取代,但是支撑技术的相关理论及其革新,只有依靠人的主体的能动性才可以做到。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包括《手稿》《形态》《贫困》《资本论》及其手稿等经典著作的探究,结合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研究的不断深入,认为马克思分工理论经历了由早期主体向度到成熟时期的客体向度的转变,早期的分工理论是在哲学话语的背景下出场,其所对应探讨的也只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成熟时期的分工理论的出场背景是科学的实证批判,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详细探究了特定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运行规律,并且明确地区分了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这两类不同的分工,从而弥补了早期分工理论本身的不足。从理论意义上来看,研究分工的意义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分工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其二,分工理论还是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口;其三,特别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终价值追求的立足点和理论出发点是不同的,其研究路径经历了从对抽象的人的解放到对现实的人的解放的过渡,而分工作为贯穿马克思一生中长时间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考察这一理论在唯物史观建构与发展中的演化过程有利于厘清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追求的人类社会中的永恒主题,并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找到一条现实的路径。而从现实意义上看,研究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也有利于解决后工业社会人工智能不断发展过程中,分工形式的改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 [1] 秦庆武.关于旧式分工和职业分工的几个问题：答郝振省、林剑等同志[J].哲学研究,1987(5):50-55.
- [2] 赵家祥.分工的实质及其社会作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3):24-29.
- [3] 韩庆祥.分工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1986(12):13-16.
- [4]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33.
- [5] 王磊.马克思分工理论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1-4.
- [6] 张溟久.分工与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的变革[J].南京社会科学,1997(10):14-16.
- [7] 曹典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12-19.
- [8]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9-147.
- [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8.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58.
- [11] 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
- [12] 张福公.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2):64-71.
- [1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9-65.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9.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07-408.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5-416.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5-220.
- [18] 唐正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J].哲学研究,2019(7):21-28.
- [19] 刘旭雯.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J].社会主义研究,2019(4):25-31.

(责任编辑：陈丽琼)